

论与批评丛书

类型学

视野下的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张永禄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主编 葛红兵

类型学视野下的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张永禄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张永禄著. —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8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葛红兵主编)
ISBN 978-7-5671-0143-2
I. ① 类... II. ① 张... III. ① 现代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 IV.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273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编辑/策划 孟庆勋 江振新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设计 金鑫 章斐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张永禄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257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0143-2/I·153 定价: 58.00 元

内 容 提 要

类型学是人文学科的显学和新的研究范式,但小说类型学才刚刚起步。《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类型理论批评史,重点考察了鲁迅、严家炎、杨义、陈平原和许子东等理论家的小说类型研究的思路,既勾勒了中国小说在“类型”维度上的存在方式和样态,又提炼了现代小说类型的“中国经验”。该书为建构小说类型学提供了历史参照的同时,还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

总 序

本课题于200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09BZW014),但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实际研究。8年间参加此课题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有俞亚赞、叶祝弟、李瑞明、张永禄、徐秀明、肖青峰、谢彩、张默、侯学标、Raffaella Buonocore(英国、意大利双国籍)、许铭、许道军、陈佳冀、谢尚发、刘凤美(泰国)、杜建、王环环、毕旭玲等19人。除了我完成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专著之外,团队完成的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论文共18篇。除中国现代类型小说理论批评史、欧美小说类型理论史研究外,我们更多的是针对某个小说类型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武侠、言情、玄幻、官场、侦探、法制、都市、成长、历史、家族、民间故事(上海海洋故事)、动物叙事、恐怖小说等近20个领域。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类型理论的缺乏、类型学方法探索的困难是一个方面,同行的不理解也是一个方面,许多同行把“类型小说等同于通俗小说”,认为这是没有前途的领域,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初步成果也曾受到种种质疑。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这是一个建构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体系、建构新的当代小说批评方法的大命题。事实也正是如此,2003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类型小说双年选》,公开提出“中国当代小说类型化发展趋势”的论断。之后,我们沿着故事形态学、结构主义思路,以“叙事语法”为核心概念,做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如恐怖小说、侦探小说、官场小说的研究等。随着类型学元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研究的

逐步成熟,我们又把研究重点扩展到“叙事成规”、“地方性叙事”与“民族志类型”、“方音类型”研究等方面,这个阶段我们还逐步提出了“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概念,这样,小说类型的嬗变规律的宏观研究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时,我们研究了武侠小说、历史小说、成长小说、言情小说、法治小说、官场小说等,并且把研究范围拓展到民间故事(上海海洋传说)、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等方面。

逐渐地,类型小说研究为社会所知悉认可,更多的同道和单位加入了这一领域。《小说评论》、《时代文学》等杂志邀约我们进行专栏讨论,《文学报》、《文艺报》开辟专栏讨论小说类型化及类型小说理论批评问题。2009年年底,我们团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和鼓励。

中国小说理论研究不发达,且当下中国小说理论和批评处于一种“用一种小说观念来研究和批判所有小说”的状况,能否建立一种真正的小说类型理论,进而在自觉的小说类型理论支撑下对小说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批评?这一工作事关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科学化”,事关中国小说理论和批评的“方法自觉”。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把“建构中国现代小说类型理论并进行分门别类的当代小说批评”作为本课题的最终目标。

晚清新小说家们抱着文学启蒙的理想,从西方大力引进新小说类型,如政治小说等,催生了中国现代小说类型化的滥觞。之后,中国现代出现了一批如管达如、吕思勉、鲁迅、郑振铎和胡怀琛等具有小说类型研究倾向的学者。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梳理古代小说类型的生成发展和历史“变形”,体现了小说类型学的部分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市场化时期的到来,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类型化发展的趋势。传统类型如武侠、言

情等得到长足发展,新类型如玄幻、穿越等不断产生,催生了中国当代类型小说的大繁荣。当代小说研究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专家钟情于类型小说的研究,如范伯群等,他们作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是,何为“类型小说”?“小说类型”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形式”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意义”概念?如何能找到一种可以内在地包含上述二者的小说类型学“范畴”系统?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葛红兵撰写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专著试图通过系统性理论思考,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实践针对性的类型学理论,为小说类型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该书以“建构中国小说类型理论,推进类型小说批评”为目的,提出超越“小说研究”沉迷于“历史描述”的现状,建构一种可以对小说进行深度“逻辑描述”的类型理论框架的构想。专著从对小说形态学、小说叙事学及结构主义小说学研究的经验总结出发,认为可以构建一种承续又超越上述诸家理论架构的“类型学”方案,并就此提出了“叙事语法”概念;作为对“叙事语法”概念的深化,葛红兵又进一步提出了“生成性成规”理论和“地方知识”理论,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支撑“类型”观念,并将之发展成方法论。该书还着重阐述了兼类、跨类、反类等概念,开启了小说类型学对小说类型嬗变进行宏观研究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对小说类型运动进行宏观历史描述的概念方案。

有了上述认识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寻找理论资源与经验支撑。张永禄的专著《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史,考察了鲁迅、严家炎、杨义、郑家建、施战军、范伯群、汤哲声、陈平原和许子东等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小说类型研究思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

历史参照系,作为借鉴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具有深度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

接着,我们探寻了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普罗普的小说形态学,这是谢尚发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研究与中国小说类型学的方法建构》研究的课题,谢尚发对普罗普著作的“经典重读”让我们团队找到了很好的理论原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案帮助我们打开了小说类型学研究的思路,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普罗普的抽象模式隔断了逻辑和历史的联系,而只有逻辑没有历史的研究方案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这样,我们的研究方向就逐步离开了故事的功能架构层面,试图用“深层叙事语法”概念来深化我们的小说类型学理论研究,这个阶段我们比较典型的成果是谢彩的《中国侦探小说类型论》,这本书用此理论思维来研究侦探小说,带来了前人未见的许多闪光点。但是对于深层语法的过多重视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封闭和开放性不足。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不那么“结构主义”的概念,这个过程极其漫长。时隔几年,直到“叙事成规”这个概念的发现,才让我们豁然开朗,这个概念让我们可以把小说的内部结构研究和外部文化关系的论述联系起来,达到内外平衡。叙事成规,不仅是叙事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成规中包含了小说类型作为“故事”的叙事语法内涵,同时也包含了小说作为“民族志、地方志知识”的叙事形态的文化语法内涵。此时,我们就可以把小说类型学上升到民族志、地方志的高度来看待,到这里我们的小说类型学找到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这个过程中许道军的《千秋家国梦——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专著的撰写和杜建的《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官场小说

的类型学研究》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和探索,我们的课题是不可能“结项”的。这个阶段,对具体小说类型的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的研究也被引入,尽管具体的成果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方法也已经基本成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把“类型指认”当做一种理论假设,当类型假设可以让我们看见别的理论看不见的东西时,这种假设的有效性就得到了验证。但是我们给出“小说类型”的定义,指认“某种小说为某个类型”,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小说类型进行简单演绎,真实的情形应该恰恰相反。小说类型研究更多地由下往上进行,更多地来自归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小说类型研究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由此我们建构了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概念,来研究小说类型的嬗变及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些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类型小说鉴别指认,而且更将拓展类型小说研究与批评的宏观关照能力。

当然,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对类型的指认曾经在“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之间犹疑,难以平衡。我们开过专题的讨论会,也写过多篇专题论文,这个时候赵牧的加盟给我们带来了《“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的研究案例,此书在我们团队内是最有争议的一部。“类型”作为一种方法,如何保持其有效的开放性?又如何保持其对“价值”、“思想”的关怀能力?这是此专著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思考。

由此,我们团队开始思考和关注“小说作为地方知识的叙事形态,其地方性意蕴正在丧失”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下小说的民族志意蕴正在消溃,这激发我们思考“在中国普通话的强势语境下,小说作为地方志,其表现地方生活的能力是提高了还是下

降了”等问题；另外，我们是否可以要求小说类型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空间类型诗学？“类型研究”如何有效地与上述“价值”问题相关联？类型研究如何在保持其“形式”关照力的同时，真正向“价值”问题开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研究还将继续进行，我们试图以类型学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一个总体性考察。也许我们能写出一部中国现代类型小说史，提出一套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中国现代类型小说分类方案；同时，在类型小说批评实践方面，我们还准备加强新生类型小说及跨类小说的研究，使我们的类型小说批评得以深化和升华。

葛红兵

2012年3月18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15
第一节 “原始”和“选文”：古代小说类型实践	15
第二节 古人小说理论探讨中的类型思想	25
第三节 类型描述：小说史叙写的本体之相	39
第二章 晚清新小说类型引进与现代小说的兴起	57
第一节 新类型引进：政治小说、科学小说、 侦探小说	58
第二节 小说类型命题热潮透视	73
第三节 小说类型理论的现代阐释	79
第三章 中国小说史写作的鲁迅范式	86
第一节 盐谷温对鲁迅小说史写作的影响	87
第二节 鲁迅小说史研究的类型视阈	100
第三节 范式效应与走出“鲁迅时代”的焦虑	107
第四章 现代小说类型研究的当代中国经验	120
第一节 严家炎、杨义的流派类型构想	120
第二节 郑家建和施战军的传统审美类型想象	130

目 录

第三节 范伯群、汤哲声的通俗小说形态—类型检视	143
第四节 陈平原和许予东的结构类型学试	151
第五章 现代小说类型学研究方法论	176
第一节 现代小说分类的方法和实践	178
第二节 小说类型的形式化：“叙事语法”探寻	204
第三节 类型小说的文化学阐释	231
第六章 新世纪小说的类型趋势与类型学研究及展望	263
第一节 小说类型化：新世纪文学重要变局	263
第二节 批评家态度：成也市场，败也市场	273
第三节 建构小说类型学	288
结语 类型与价值	309
参考文献	331

绪 论

当下小说批评(乃至文学批评)日渐陷入困境,这是学界的共识。导致困境的原因很多^①,但以下两种情况却往往被忽视:

(1) 小说理论、小说批评和小说史的研究与作家们的创作、读者们的阅读实际分离。

由于小说观念狭隘,“纯文学”观念成了研究者们开展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紧箍咒。“探索小说”、“人文小说”成了统摄所有小说进而排斥其他小说类型的铁律,很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阅读量的类型小说被排斥在文学史的对象之外。小说批评则常常视那些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为“通俗小说”而予以“学术性”排斥。小说的写作阅读和批评间的错位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尤为突出。随着文学生产的市场化、读者审美需求的阶层化、作

^① 近几年学术界为此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很多学者比如李敬泽、郜元宝、吴俊、杨扬、葛红兵、谢有顺、施战军、李静、王德胜、陈冲、洪治纲、刘复生等都著文专门论述。归纳他们的观点,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信息文化崛起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空间,它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生态甚至价值观念,进而形成了文学评价体系的失范(洪治纲);纯文学的萎缩与文学性的蔓延,或者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了文学的终结;文艺理论的贫困导致了文艺批评的瓶颈;文学批评越来越依托于一种叫作文学的专业对象,成为一种很个人化的身心调养术或技术性很强的专业,从而不再富于想象力和批判性精神,不再是原创思想的策源地,不再是一种指向当下的价值创造的行为和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实践(刘复生);批评主体性失落(陈冲、杨扬)等。

者身份多样化的发展,中国现代小说在类型嬗变的基础上,出现了进一步的类型化趋势。既有类型,如武侠、侦探、言情、官场等得到了长足发展;新类型在不断产生和定型,如玄幻小说、网游小说、穿越小说、架空小说等。但是,中国的现代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却不能及时而准确地描述和解释小说创作与接受事实,以致大量市场畅销和网络上热传的小说被排斥在文学批评视野之外——专业报纸和刊物忽视对当代类型小说的批评文章,学院批评往往把言情、侦探等类型小说排斥在研究评论范围之外。这种批评与创作、阅读的严重割裂在市场化语境下势必让小说批评陷入困境。

(2) 现代小说理论批评整体上依然处于“非科学”状况。

尽管我们的小说理论批评学科已经创建近百年,但它依然处于“对象缺乏种属分类、代表性的种属缺乏集中研究”的状况,“用一种小说眼光对待所有小说种属”是非科学的根本标志。不同种属的小说,其文本解读需要不同的理论框架和标准,朱光潜先生早在1940年就指出拿《红楼梦》的标准衡量《水浒》是不对的。具体文本只有放到相应的小说类型长河中,用该类型的基本语法尺度和规约考察才能真正鉴定其艺术继承性、规范性,也才能真正衡量其创新性、突破性,这样的文学批评才称得上“学术性”和“规范性”,专业的小说理论批评也只有这样才能是“科学的”。另外,由于缺少专业的基本的科学尺度,大量印象式批评充斥文坛,让人们在区分专业批评、媒体评论和一般读后感时往往无所适从(当然那些“标识”学院批评的抽象晦涩的理论演绎除外),专业批评的指导功能被自我消解,小说批评似乎沦为没有门槛的“公共空间”。我们经常听说过或者在不同场合遭遇到“谁都可以说上几句”、“怎么说都可以”的尴尬。

综合起来,以上两种情况都反映了小说研究和批评中的非科

学性问题,非科学性是小说批评陷入困顿的致命“内伤”。

危机和生机总是相伴而生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到类型学研究正在成为人文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①,把积极治疗小说批评困顿的“药方”寄托在现代类型学上。2008年,类型小说研讨会相继举行,中国第一个类型小说奖也于近期设立,有的学者呼吁建立现代小说类型^②。参照其他人文学科类型学研究的火热势头,我们不妨乐观地设想,现代类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学术范式,及其催生的现代小说类型批评学为当下小说批评走出困境、重振雄风指引了一条康庄大道。

那么,什么是类型研究方法,什么是类型学呢?类型作为一种观念,是人们认识和区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相似或相同的部分事务(有限联系)存在,人们为了把这些相同或相似的部分指认出来,并和其他不同的事物相区别,归纳的方法就产生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种思维的反映。“物以类聚”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种途径,也是把世界秩序化的有效方法。前世界本来是混乱的,但是智慧的人类靠思维用东、南、西、北、中、上、下、左、右做空间划分,用过去、现在和将来做时间划分,对飞禽走兽和花鸟鱼虫等做种属分类等等,经过时空和类的有序化,世界就形成了。不过,这仅仅是思维的本能,是认识论的初步,有很大经验论成分。随着思维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人们对类型思维和方法的认识越来越自觉,也越来越深入,对科学性和规范性的诉求导致了类型学的兴起。类型学(typology)其实是一种分组

① 语言学、电影电视学、法学等领域已率先开展了现代类型学研究,并涌现了大批成果,已成为学科发展的热点。

② 葛红兵,赵牧.中国经验·现实视角·反思维度[J].当代文坛,2008(6).

归类的方法体系,通常称为类型。类型的各成分是用假设的各个特别属性来识别的,这些属性彼此间互相排斥而集合起来却又包络无遗——这种分组归类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一个类型可以表示一种或几种属性,而且包括只是对于手头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特性^①。在文艺思想领域里,类型也是源远流长的方法,不同的是,其命运曲折多变而已。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按“模仿”的媒介、对象、方式把文学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三大类;他在《诗学》第二章中曾以道德为标准划分人物,认为“人物要么比我们好,要么比我们差,要么等同于我们这样的人”;在第十三章中,他又对故事情节做了规定,认为“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且任何“构思精良的情节”必然据此“单线”建构。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物塑造和情节的“类型论”后来成了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贺拉斯在《诗艺》里也强调,文学创作应该以古希腊的经典性作品为典范,塑造的人物性格要始终如一,以达到人物性格的和谐统一,要求“不论作什么,至少要作到统一、一致”,“每一种特殊的体裁都必须恪守派给自己的领地”^②。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在新古典主义理论法典《论诗艺》中进一步提出,塑造人物必须保持其“自然”人性,因为自然就是“真实”,也只有按照某种类型来塑造人物,才会获得成功。同时,他还指出要借用传统人物,必须保持他们的固有性格,不能改变他们的性格类型。约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② 贺拉斯. 诗艺[M]//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翰生则直接提出纯粹“类型说”：“诗人的任务不是考察个别事物，而是考察类型；是注意普遍的特点和注意大体的形貌。他不数郁金香的纹路和描写森林的深浅不同的绿荫。在所描绘的自然画像中，要能展现出那样一些显著的特色，使人一看就想起原本，某一个人会注意到而另一个人会忽视的那些区别必须省略掉，要突出那些对有心人和粗心人都会同样明显的特征。”^①这包含了“类型”须纯粹、一律的观点，成为新古典主义作家创作的规范。贺拉斯、布瓦洛和约翰生等古典主义诗学观念的类型理论强调类型的重要性，但过分强调了人物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方面，主要集中在人物的类型化、情节的类型化、语言的类型化以及构思的类型化等。读者只要识别出一种类型，运用类别的方法将其与其他类型作静态比较就可以，而忽视了个性的、特殊的和复杂性的一面。随着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的启蒙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得到了空前的推崇，文艺思想把重点放在了“个性”方面，共性的、普遍性的受到排挤和冷落。歌德就曾严厉批判过类型说，认为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因而，提出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问题，强调“诗人必须抓住特殊，如果这特殊是一种健全的东西，他就会在它里面表现出一一般”^②。不过，19世纪发展并成熟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说”在克服一分为二、厚此薄彼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同时，发展了古典主义的“类型说”。典型人物理论在个别的、特殊的人物和环境凝聚着特定社会、阶层、人群的内在稳定性，即某种社会属性、价值观和人生态

① 约翰生. 莎士比亚戏剧集[M]//西方文论选.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② 歌德. 歌德谈话录[M].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